

三条辫子 郭良正

中华民国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改朝换代,移风易俗,人们生活习惯有了一个新改观。规模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就是剪辫子。男人拖在脑后那条辫子,随着已逝朝代,被扔进了历史深处。

除民间个别遗老遗少外,都以精神短处处世,偏在这时,仍有少数人以少有胆量和气派,拖着辫子在大众场合招摇过市。尤以王闿运、王国维、辜鸿铭三人最为醒目,他们戏称为民国时期的三条辫子。

三条辫子共有一个特点是,生在清末,成熟的光芒闪耀在民国初年。说法似乎有些过誉,实则不然,因为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硕儒,仅以学术而言,近代中国无有能出其右的。

王闿运历来以帝师自诩。死后能否谥“文正”暂且不论,反正生时已晋“太傅”了。民国时,王闿运进入暮年,头发稀疏寥寥。

王国维的辫子和他人一样曲折。其实,他并不是不剪辫子,而是识时务的阶段性剪而已。据吴其昌披露:“清帝逊位后,罗振玉逃亡日本,先生(王国维)也随罗东渡。先生的辫发本早已剪去,且平居西装革履,俨然是一新少年。”只是后来为表示对清的忠贞,又蓄起来了。

对清的忠,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后来他也有机会成了(退位溥仪的)“帝师”。抱着瘦死骆驼比马大的幻想,意图东山再起。执掌溥仪也不仅是图个虚职,而是有实实在在实惠:恩加五品衔,赏食五品俸,并赏赐紫禁城骑马。这是多少名师生求之不得的事,而他却得到了。这要是不再死心塌地愚忠下去,就情无可原了。于是,那根脑后之物也就理所当然地晃荡下去了,直到沉湖绝命。

辜鸿铭这条辫子更是了得。在西方人看来,辜鸿铭和泰戈尔难分伯仲,视为东方圣哲,曾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以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足见辜氏在人们心中分量。

辜鸿铭是相当复杂的人物,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妻在东洋,仕在北洋。无论人生多曲折,学问多庞大,但辫子历来是这位圣哲的焦点。而他则不以为然,曾说“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尤其对学生的一段话:“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你们辫子是剪掉了,但落在你们血液里的华夏文明,是想抹也抹不掉的。”言之凿凿,这是足以让辫子留下下去的最大理由。

现在街头,蓄发男士并不少见。对那三条辫子也没太大指责理由了,撇开辫子,不说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和传承,这倒是不能忽略的。

“深扎”是创作优秀作品的根本 ——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有感 八月天

近来,一部主旋律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从“90后”到“60后”的观众,被一网打尽,创下了湖南卫视三年来所有开播电视剧收视率之最,并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据媒体报道,这部反腐大剧自3月28日在湖南卫视开播,即走上了“爆款”之路,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均刷出了惊人的数据,掀起了全民观看热潮。而且,很快原著同名小说热销脱销,付费电子书阅读量破亿。

窃以为,该剧的走红,除了片子品质过硬,直面当下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戳痛点”“接地气”,和编剧的宏大叙事能力之外,其对于生活的深入与把握,也是获得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家、艺术家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也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必由之路。

《人民的名义》作者是有“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之称的作家、编剧周梅森,他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作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据悉,这是周梅森沉寂八年之后,再度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保持了他一贯贴近时代、家国情怀、重视悬念、层层剥笋的风格。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之大,行动态度之果决,前所未有,引发国内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为充分展现中央反腐工作的坚定决心,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反腐精神,2015年,最高检察院派专员到南京找

到周梅森,希望他能写一部新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周梅森看到了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反腐的大势,更看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效果,认识到反腐倡廉就是中国的春秋大义。于是他便以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态度,创作一部反映时代特征、突出反腐特点、体现检察特色的正能量作品,《人民的名义》便应运而生。

2015年春节后,周梅森开始深入省检察机关一线体验生活,在江苏各级检察机关、反贪侦查指挥中心、监狱等地采访调查,与办案检察官、纪检干部、监狱干警、服刑贪官等人员座谈,获得了第一手的写作素材。除了体验生活,周梅森认真地把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真实案例做了详细的分析。接下来,他用两年时间创作了30余万字的同名小说,后又改写成电视剧本。周梅森认为,这是他创作生涯以来最好的作品,也是他写得最为酣畅淋漓的小说,全面超越了他过去所有的作品。

周梅森在监狱中和一些落马贪官座谈时发现,不少贪官进了监狱后会觉得自己委屈,这让他很震撼,党和政府花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资源培养他们,而这些官员们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没有了。周梅森在以往的作品多以针锋相对的政治交锋为特色,这一次他希望对人性做一些深入挖掘。于是,在作品中,他就使用了一些新的桥段,比如,一位贪官在被抓走之前,最后还给检察官上了一课,尤有讽刺意味。

周梅森多年来对检察系统比较熟悉,这为他虚构人物打下了生活基础。作品中表现的一名“小官巨贪”在家里搜到2亿现金,就有众所周知的现实原型,把他变成一个艺术形象,给观众、读者造成的冲击力都非常大。而作品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没有原型的,那是从生活中提炼加工来的,虽然是虚构的,但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让读者与观众从这些人物的身上看到非常熟悉的故事和身影。

汉东省、故事大背景也是虚构的,但因为作者对中国目前高压反腐下的政治生态与政法帮、秘书帮等官场圈层文化的熟悉,写起来就得心应手,给人们的感受很真实。

周梅森2014年曾卷入老家一场股权官司中,这场股权官司的经历,成了他作品中的故事原型,也非常逼真。

《人民的名义》不仅是一部反腐作品,还涵盖了高官、知识分子、商人、市民等各色人等,堪称一幅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由此可见作者生活经验的扎实。

作品中“裸官下岗”之规定、“转帖500次入刑”的法条、“拆出一个新中国”之谬论、“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等笑谈,带着流行色彩的人物对话,都是作者对现实生活掌握之后的提炼加工。

可以说,这部作品既有磅礴跌宕的大气格局,又充满值得深思玩味的细腻之处,这无疑是作者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的诠释,也是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担当。



清香春韵(国画) 张海疆

人间四月海棠花 秦若水

我是极爱她的。她是我们单位办公楼前的一排花树。杏花开时,我跑去见她,她很沉静,没有任何春心萌动的征兆,冷冷地伸着枝条。满街的桃花点燃春梦的时候,我又去看她,她只淡淡地吐出嫩芽。哦,我明白了,原来她是先发芽后开花的。

我还是天天去看她。去后院放车子路过时,抬头看一眼,嫩芽,泛绿泛红呢;步行到办公楼前时,拐几步,看她叶子比昨天大了;在大门口路遇到同事,一起说笑着上楼,远远地斜睨一下,那叶子成簇了。

突然有一天,一进大门,我远远地看到叶子丛中一簇簇的白,忙跑过去一看,是花苞。看到是白,实则还有淡淡的粉红。隐藏在背后的小苞是较浓的水红;微微绽开的花苞红晕已经消退,呈现粉红色;个别全开的花朵根部淡白,只有花瓣边上更浅的几粉了。

香是必须的。暗香浮动,香香甜甜,清新淡雅,不油不腻,非常适合长时间地趴在花上嗅。我向来把香分为三品。三品的太俗,浓烈的,远远地就能使人窒息;中品的太艳,猛一闻,沁人心脾,再一闻,心烦躁;唯有这品香,清淡雅致,近了,和风细雨,远了,山峦雾边,清新得让人不舍不弃,可以放鼻头、警发际、卧枕边。而这一树花儿便是久放鼻头不用拿去的极品。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是最美四月天”里的四月花啊!你的名字叫海棠。在《红楼梦》中,应该是那个叫湘云的姑娘吧。

花开了,人便不应闲着。我日日站在二楼的窗口看她。楼下的姐姐上楼叫我:快来看,花枝伸进我的屋子里了。我们两个跑去看,那一个拱拱的海棠竟穿堂入室,成了座上客。姐姐爱惜,随了她的意,索性敞开窗子,夜间也不关门,任她肆意而为。看来,这海棠开花于人并非我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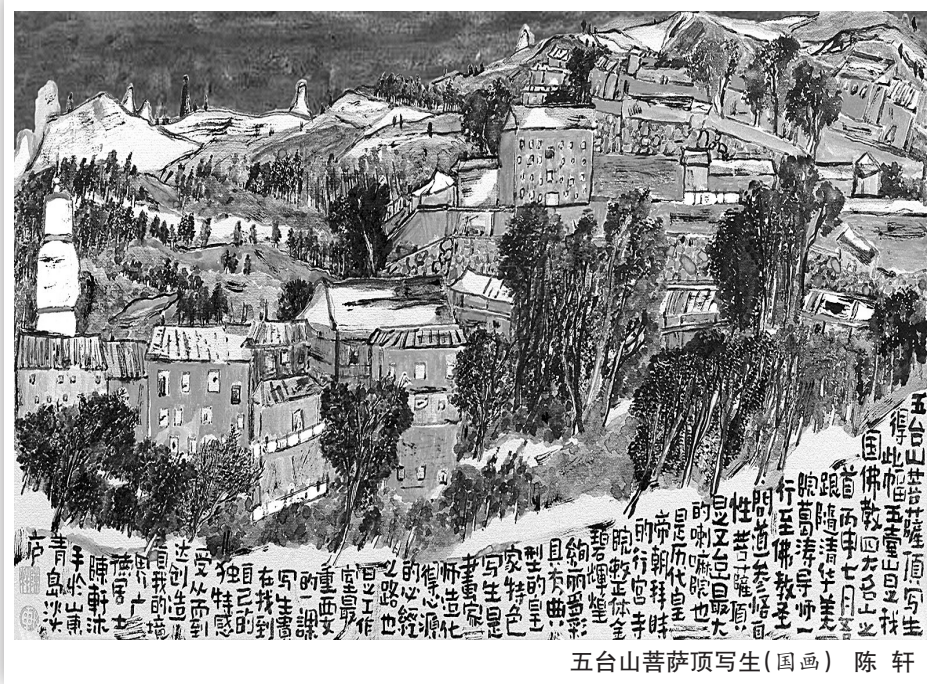
三月,我在客厅里插了两枝桃花,已经花褪残红,叶子绿绿的越来越大。四月,我想带枝海棠回家。到了家里,我把花放到我家猫咪的鼻子上,问:翠花,你闻闻香不香?翠花闻闻,拱拱拱的懒腰,喵了一声,倒地打了个大大的滚儿。

我把她放进白瓷雕花的小瓶里,添了水。晚上,再去见她,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花瓣合拢了,低垂了。我吓了一跳,难道她要枯萎?我惴惴不安起来。

天亮了,我再去看看她,她竟然精神抖擞地仰首怒放,旁边的花蕾也松开了苞,马洪生,你亏了良心,你看看这是啥,说着他把坤乾的报告拍在办公桌上,马洪生侧目看:关于马洪生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的申请报告。郑厂长看到愣在那里的马洪生说,昨天晚上坤乾给我发微信说,这次晋级只能给你,你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要辞职,你看看,你还不这里指着他的鼻子发火,你对得起他吗?马洪生摸着后脑勺说,那,那烟?坤乾笑道,啥烟不烟的,赶快给咱郑厂长上烟,你能晋级多亏郑厂长公正廉明。

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学校,国家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这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受了那个年代作为资本家子女所受的种种歧视。记得小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腰鼓,还教过我打出好多花样,因为腰鼓打得好,在学校被选为校腰鼓队领队。父亲还常常小声而深情地教我唱《东方红》《兄妹开荒》《翻身道情》《黄河大合唱》《战斗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对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等,用的都是陕北方言,父亲还教我说陕北话:“给你拿个黄格腾腾的热馍馍吃……”他那深情的歌声和激动的表情让我难以忘怀。不知怎的,从那时起,一听到陕北民歌,陕北话,我顿时感到全身热血沸腾,每根神经都兴奋起来。这也许是我们父女气息相通、血脉相连的缘故吧!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十分紧张。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叫嚣要反攻大陆。当时,父亲每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就



五台山菩萨顶写生(国画) 陈轩

“刺啦啦,刺啦啦”电锯在体内游走,血肉飞溅。“咚咚咚,咚咚咚”又是一阵声响,坤乾听到了自己的身体被钉在画好的图形上。是电脑设计的图形,每一个钉的位置都是设计好的,不多不少9999个钉子。他感到浑身疼痛,挣扎着用身体伸开腿站起来,一翻身落了下来,随着一声“咚”坤乾惊醒,身上滑津津如同从浴缸中刚出来。

坤乾在电厂任办公室主任,每天要批改公文,写材料。肩膀疼、腰疼疼半年多了,有时厉害了就贴膏药贴一下,什么虎骨膏药、黑膏药、老郑传统膏药、老魏电子贴,前天揭开那个从老家带回来黑色的、黏黏的膏药,坤乾脑海中出现鹤发童颜的神仙,预感自己就要好了,可尝试了种类繁多的膏药盛宴,疼痛依然坚强地钻进肌腱,钻进骨头,驱之不去,赶之不走,令他平添万千烦恼和痛苦。

脑海中那拉锯声和钉钉子的声音不绝于耳,他又想起了白天在养生会馆里的杜大夫。杜大夫亭亭玉立,将近五十岁了,那身材和气度仍然令人惊叹。她手中的银针就像是画笔,正在病人脊背上细心地刻画,在画一幅美丽的画,或者在设计一幅图。坤乾有病乱投医,昨天疼得顶不住了,就看见了门口这块“专制颈肩腰腿疼”的招牌。杜大夫看见他一脸灿烂的笑,听他描述了一下病情后,让他趴在床上,说他肩部左边高右边低,肩膀也有点向右倾斜。杜大夫轻柔地说,疼痛主要来自旁逸斜出肌肉的拉扯,要想矫正必须将这些结节打开切断,杜大夫的话让他一下子恍然,要治好病必先

微型小说 矫正 蒋晓云

矫正好身体。哎,这恼人的疼痛,他恨不得自己的身体变成泥,把身子揉捏得端端正正。对了,就是杜大夫的这句话让他才做这种血腥的噩梦。

杜大夫用针给他矫正,并要他积极配合,注意自身的端正。他注视着床,把床上画出经线和纬线,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工工整整地摆在床上的经纬线上,这种约束让他很难受,站在电梯上,他把门中间的缝对准两个眉毛中间,两腿分开,整个身子站成以门缝为中轴的对称体,到了办公室他开始在桌子和椅子上画线、经线、纬线,然后自己按经纬线坐定。这才开始写材料,虽然不舒服,但随着杜大夫针扎、刀切等痛苦漫长的治疗,颈肩腰腿完全恢复,自己居然习惯了端正的坐姿,他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电厂最近要评定职称,有三个人符合条件,但只有一个指标。张金山老婆常年有病,家庭条件很困难,彭超凡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去年因为一项设计,还为电厂节约了三十多万元的经费投资,而且他的姨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郑厂长,可是马洪生明年就要退休了,在单位干了一辈子,错过了这

新书架 《世界的凛冬》 王敏

除了莎士比亚,只有他写过人类整个世纪的故事。福莱特以持重、精湛的文笔,在学院派的历史写作与民间娱乐式的历史写作之间,开辟出了一条堪称完美的通衢,它直指普通人在历史之中跌宕起伏的命运,直指人类在面临抉择时的邪恶与善良。

“世纪三部曲”是肯·福莱特的野心之作,《西雅图时报》盛赞:“整个20世纪的吉光片羽,都被肯·福莱特写进了这部伟大的小说里。”作为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的第二部、《巨人的陨落》续篇,《世界的凛冬》的故事始于那个裂变中的大时代——希特勒上台,爱德华八世退位,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世界剧烈改变,我该怎么办?这正是他们的困惑——一群处于人生黄金时代的少男少女,来自德国、美国、英国、苏联和威尔士的大家族,他们父辈的命运因一战而彻底改变。如今,世界再次破碎,甚至更加暴烈和残酷。然而,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在时间的永恒流动中,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所以,为什么不一起来,会一会命运?

辈子就没有晋级的机会了,单位沿袭下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职称评定面前所有人为该退休的人让路。这时候坤乾接到郑厂长老婆打来的说情电话,彭超凡可是有功之臣,年轻有为,这次提拔必须晋升职称才符合条件,你不能扼杀了一个优秀的后备干部;张金山提着烟酒茶叶来求情;一向耿直的马洪生竟然也送来两条烟。一时间坤乾感觉头疼,这几个人在脑子里盘旋鬼混,竟然生出一个个结节,正如自己体内纠缠的结节,揪得他难受疼痛。

他徘徊着,看到墙上、床上、办公桌上画的一道道笔直的经纬线,心里豁然开朗,不能再被这些结节所左右了,他驱车来到张金山和马洪生的家门口,按响了他们家的电话,收受的礼物被一一退还了,他长出了一口气,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第二天,他跨进郑厂长办公室,郑厂长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马洪生进了屋看到这个场面,怒从心头起,对着郑厂长和坤乾大声指责。郑厂长一拍桌子红了脸,马洪生,你亏了良心,你看看这是啥,说着他把坤乾的报告拍在办公桌上,马洪生侧目看:关于马洪生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的申请报告。

郑厂长看到愣在那里的马洪生说,昨天晚上坤乾给我发微信说,这次晋级只能给你,你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要辞职,你看看,你还不这里指着他的鼻子发火,你对得起他吗?马洪生摸着后脑勺说,那,那烟?坤乾笑道,啥烟不烟的,赶快给咱郑厂长上烟,你能晋级多亏郑厂长公正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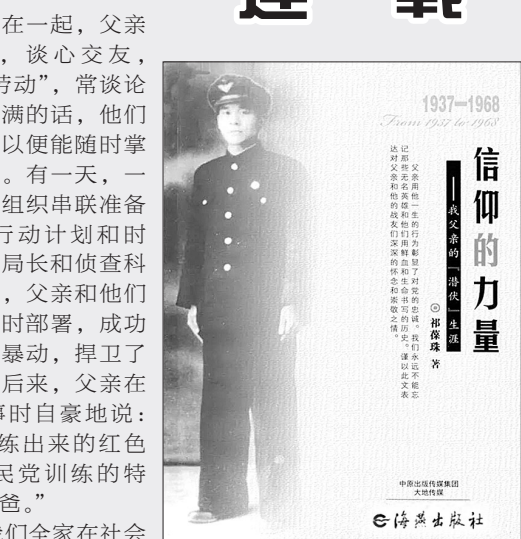
连载

忍辱负重,和平环境下甘当“无名英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全家和全国人民一样为之欢欣鼓舞。经组织批准,我们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父亲将要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我们打好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准备成立平原省,在河南工作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父亲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全家就留在了河南。1949年8月20日,平原省成立。1949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公安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罗瑞卿部长作重要讲话,他说:“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同没有拿枪的敌人还要继续战斗下去。”接着,平原省公安厅在辉县组织召开了我省地下党情报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被编成代号,只称号码,不称姓名,与会人员相互之间不问姓名。在那次会议上,领导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新政府,

但社会还很不稳定,很不平静。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反革命集团、反动会道门,还有国际间谍,他们伺机大搞破坏活动,爆炸、暗杀、张贴反动标语等时有发生,妄图推翻新生的革命政权。现在,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人民的安宁,我们的隐蔽工作不但不能减弱,还有待加强,以前隐蔽战线上的同志,有的还要继续隐蔽下去。党组织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决定我父亲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潜伏”下去,而且我们家要继续做隐蔽侦察点,母亲也不能公开参加工作,并说:王建淑同志的任务就是做好“家庭妇女”,继续做好掩护工作。我的父亲母亲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为了党的事业,他们甘愿以灰色面目出现在社会上,继续为党的隐蔽战线的光荣使命而奋斗。

1950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为了协助父亲取得敌特的信任,党组织决定让我父亲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训练班”卧底,与国民



信仰的力量

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父亲与他们称兄道弟,谈心交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他们对父亲毫无防备,以便能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公安局局长和侦查科长“提审”我父亲,父亲和他们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挫败了这起反革命暴动,捍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后来,父亲在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爸爸。”

然而,当时我们全家在社会上却戴着“反革命特务家庭”的帽子,随时都会遭到革命群众的唾骂,街上思想先进的居民还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的“情况”,我们全家人忍辱负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父亲因“认罪态度好”而被“释放”。我隐隐约约记得父亲回到家时的情景,我认不出他了,头发和胡子很长,人很瘦,背着小包裹,他走到我跟前轻轻地叫我,我仰着头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周围每个人严肃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是父亲,接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来,当时,父亲和母亲都流泪了。我叔叔婶婶也在擦眼泪。

高处有一个指头尖大小的孔,可以观察外面情况。我当时3岁左右,常爬在小孔那往外看,看到过往的行人,还看到过大狼狗。妈妈说我的脑子聪明,记忆力特好,哪个叔叔从胡同口刚拐过来,我就认出来了,都能叫出他们名字(编号),马上跑去告诉妈妈,我常常受到叔叔们的夸奖。

公安机关在新乐路51号原地下情报站处又给我们家建了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堂屋房顶上还铺了个白色和平鸽雕塑,两边各插了一面小红旗。临街高大的门楼下是两栅大黑门,门上两个对称的大铜环,与当时街道两旁邻居又低、又黑、又破的小房子形成很大反差,看起来像是个十分富有之家。对外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我家公安机关的一个办公地点。我们全家住在这个大院,为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们做好侦查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作用。这样,我家由新中国成立前战争年代的党的地下情报站转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公安机关侦察点。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那些革命干部的

与收音机一起高唱《国际歌》,后来还教会了我们姊妹五人。每天晚上我们都与母亲围坐在收音机旁,一起听新闻,一起唱《国际歌》,父亲还充满激情地打拍子当指挥。当唱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中共河南

1963年年初,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刘鸿文听取了省公安厅一处处长皇甫书信关于我省干部情况的汇报,刘部长请公安厅推荐人员,协助他们做统战工作。1963年10月,父亲调到河南省公安厅工作,1964年7月调到省政协,他的公开身份为河南省政协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由省公安厅宋承先同志一人办理有关手续,让我父亲一个人到省政协说是刘鸿文部长让来报到的。当时就安排我们住在省政协机关大院内。大院北临第三路,有两栋三层家属楼,我们住在西二楼东。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信仰的力量》,本报有删节)